

# 在場的權利：中國的推特政治



過去十多年間，以互聯網為主要公共空間的新興公民社會開始在中國出現，並伴隨着不斷發展的抗爭運動，改變着中國當下的威權政治性質。截至2010年底，中國互聯網用戶達4.57億，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用戶群<sup>①</sup>。在用戶規模擴大之後，互聯網向Web 2.0時代的進化，即各類社會網絡服務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SNS) 特別是「推特」(Twitter) 的湧現，將給中國政治特別是威權的延續性帶來何種影響，還是個未知數。本文擬從系統控制論的「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 角度做一個初步性探討，以期先行理解這一快速興起且不確定的現象，為今後更好地解釋並展開經驗研究打下基礎。

截至2010年底，中國互聯網用戶達4.57億，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用戶群。在用戶規模擴大之後，互聯網向Web 2.0時代的進化，即各類社會網絡服務特別是「推特」(Twitter) 的湧現，將給中國政治特別是威權的延續性帶來何種影響，還是個未知數。

## 一 中國「推特政治」的回顧與觀察

隨着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束，推特、「臉書」(Facebook) 和Youtube等Web 2.0的代表性社會媒體 (social media)，催生了第一個「互聯網總統」。由此，社會媒體的政治效應開始引發學界的強烈關注，「推特政治」(Twitter politics) 也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sup>②</sup>。

事實上，早在這次大選之前，美國的社會網絡就已發揮高度的政治效應，被稱為「第五十一個州」<sup>③</sup>。不止在美國，在某些民主轉型滯後的國家，Web 2.0同樣顯示了驚人的政治生機，學界的跟進研究尤其集中在2009年4月和6月先後在摩爾多瓦和伊朗爆發的「推特革命」(Twivolution) <sup>④</sup>。早年曾經成功引發菲律賓總統埃斯特拉達 (Joseph E. Estrada) 下台和烏克蘭「橘色革命」的傳播方式主要基

\* 本文初稿曾在2010年「北京青年政治學論壇」上宣讀，英文版曾在2010年6月29至30日北京大學第8屆「中國互聯網研究」會議上宣讀，感謝北京大學胡泳博士和互聯網專家毛向輝的批評意見，感謝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王雪蓮基金對本研究的支持。

於手機短信，而摩爾多瓦和伊朗的抗爭行動則帶有Web 2.0的印記，表現出更強的街頭動員烈度，只是其未竟結局多少遮蔽了人們對推特在民主化過程中傳播效果和動員能力的認識。

在中國，有關統計顯示，絕大多數互聯網用戶也經常使用社會網絡服務，主要包括「QQ校友錄」、「人人網」、「新浪空間」、「51.com」和「開心網」。這些SNS用戶大多擁有多個帳戶，多數用戶受過大學以上的教育，教育程度高於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平均教育水平<sup>⑤</sup>。同時，在超過7億手機用戶中<sup>⑥</sup>，常常通過手機上網的用戶規模也有3.03億<sup>⑦</sup>，而手機上網正是推特應用和普及的一個重要條件。

雖然互聯網在中國大陸受到審查制度(即「防火牆」[Great Firewall])的嚴密封鎖，但是借助五花八門的「翻牆技術」和上百種應用程序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推特的中國用戶依然逐步增加。2008年4月，推特的中國活躍用戶僅為7,000左右；而到2010年3月，若以推特意見領袖的跟隨者(followers)來計算，活躍用戶數的保守估計介於2萬到4萬之間，用戶規模總數約10萬左右<sup>⑧</sup>。伊朗2009年6月「推特革命」期間僅有約5,000至8,000名活躍的本土推特用戶<sup>⑨</sup>，由此看來，將近4萬的中國活躍推特用戶在規模上已經相當可觀了。在這一背景下，即使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後在中國境內的自由連接被切斷，推特仍然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特的社會政治平台，開始在隨後的多次社會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且正在引領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中國新興公民社會。

總體來說，在中國用戶群中，特殊的推特政治已經初步形成。通過對推特的參與性觀察，我們可以發現，推特政治中呈現着三方面的特點，分別對應於日常討論、網絡化效應和推特在行動一事件中的表現等。

第一，高度政治化。儘管在設計之初推特只是一個社交網站，在歐美地區的推特用戶也偏重日常生活和交往話題，但自從在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中首次顯示其強大的傳播和動員能力之後，推特的社交—政治傳播整合功能開始受到重視。在中國，儘管至今其用戶數量仍然相當有限，但由於具有獨特的開放技術及其處於「防火牆」之外的相對隔絕狀態，反倒使得推特既能在用戶經過簡單學習之後突破封鎖，又可以成為一個幾乎不受中國現行審查制度干擾的言論自由平台。由此，推特與普通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論壇和博客 (Weblog) 網站明顯不同，而這些論壇和網站受到愈益嚴格的互聯網審查而日漸呈現去政治化或犬儒化的態勢。

由於話題禁忌甚少，推特開放的交流特性一旦形成，其政治極化的發展程度就大大超過了海內外的其他中文BBS網站。推特繼承了十幾年來自由主義網絡空間和抗爭運動的特點，其日常討論具有更加鮮明的反威權性質。以一度相當活躍的推特中文應用網站「推特中文圈」(Twitese)為例，在2010年3月29日的「中文推客排行榜」中，政治議題「推客」連岳、艾未未分別位居第三和第四，前二十名還包括了冉雲飛、馮正虎、北風、閻丘露薇和安替等純粹的政治推客<sup>⑩</sup>。

在中國，儘管至今推特用戶數量仍然相當有限，但由於具有獨特的開放技術及其處於「防火牆」之外的相對隔絕狀態，反倒使得推特既能在用戶經過簡單學習之後突破封鎖，又可以成為一個幾乎不受中國現行審查制度干擾的言論自由平台。

第二，意見領袖群體聚集。政治性議題和推特的開放式鏈接，吸引了絕大多數過去十幾年從新興的互聯網公民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新公共知識份子、社會運動知識份子和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如余杰、溫雲超、趙輝、浦志強、何清漣、吾爾開希等。他們集中現身並參與這個開放平台的日常討論，促使推特自然成為中文論壇甚至國內傳統媒體的引領者。此處的「引領」，指的是意見領袖網絡或者社運領袖網絡的公開化和深化（即網絡的重疊與聯繫強化），既包括新意見領袖的產生和「推友」聚會對網絡關係的加深，也包括這一網絡深化過程的溢出，即推特話題和觀點對其他網站與傳統媒體的影響。

第三，集體抗爭行動的深度參與。雖然中國還遠未形成摩爾多瓦或伊朗「推特革命」的態勢，但過去一兩年來的發展已經表明，推特正在成為中國許多抗爭行動的策源地以及協調和傳播的平台。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有2009年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建設抗議和馮正虎滯留東京成田機場92天的事件。推特作為唯一連續實時、密集報導和討論的公共平台，分別見證和影響了這兩件抗爭個案的進展與結果。在互聯網審查加劇的今天，推特政治的動員和傳播效能以及行動能力都通過這兩件個案展現出來。此外，幾乎任何一個抗爭行動議題以及政治議題都能在推特上看到，日常發生的政治事件、背景討論和抗爭行動已經成為推特日常流量的主要部分，推特也因此可視為中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窗口。

幾乎任何一個抗爭行動議題以及政治議題都能在推特上看到，日常發生的政治事件、背景討論和抗爭行動已經成為推特日常流量的主要部分，推特也因此可視為中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窗口。一種可觀的推特政治逐漸形成。



2009年11月23日，廣州市政府前番禺市民抗議垃圾焚燒廠建設計劃的行動。

結果，一種可觀的推特政治逐漸形成。對中國當下抗爭運動的網絡、行動、認知等，推特均產生加速推動的作用，能夠連續製造抗爭行動或事件。在2009年12月底抗爭運動遭受指標性壓制之後，以推特為主要參與方式的參與民主，正成為中國當下抗爭運動的重要樣式。從2010年上半年的持續實例觀察可知，推特能夠有效聯接抗爭行動現場，保持抗爭運動個案與整體的理性化。

從中，我們還能觀察到中國各類社會運動的積極活動份子、運動知識份子、媒體從業者和相當廣泛的同情者，在推特平台上審議時政。基於此，推特政治，即以推特為平台的參與型民主樣式，成為中國威權政治內部的一個有趣發展。

## 二 中國「推特政治」的共時性

對推特政治發展的解釋，既離不開對Web 2.0的互聯網技術做仔細分析，也需要聯繫此前中國互聯網與抗爭運動的歷史。筆者的博士論文已經揭示，Web 1.0時代基於互聯網的中國新興公民社會，可被視為一個正在形成中的自創生系統 (autopoietic system) ①。循此路徑，在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經驗研究之前，從馬圖拉納－盧曼的結構耦合理論 (the Maturana-Luhmann theory of structural coupling) 出發，本文假設，推特政治的出現與此前中國Web 1.0時代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公民社會存在着連續性，並從推特政治的上述三個特點抽象為三層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

所謂「結構耦合」的概念，最早由著名智利生物學家和控制論者馬圖拉納 (Humberto R. Maturana) 提出，指的是結構決定的細胞系統或生命系統的變遷過程中，其歷史性或現時性的互動導致兩個或更多系統間的結構一致性②。而對於所有生命系統的變化，都存在結構的變化和變化中介的結構，它們的一致變化即結構動力，導致互動系統的結構一致性③。這一概念被德國社會學家盧曼 (Niklas Luhmann) 借鑒，應用於社會系統，儘管馬圖拉納一直強調細胞系統與社會系統是不可相通的。

在社會系統中，如盧曼早就強調的，交流是系統演化最重要的媒介，「系統的分化只能通過交流的分化產生」④。由於互聯網的發展，計算機網絡作為社會系統交流的中介，從一開始就具備了瑞恩構爾德 (Howard Rheingold) 在1993年最早提出的「虛擬共同體」(virtual community) 的可能⑤。而當Web 2.0時代的臉書、MySpace、推特等社交網站出現之後，相對於Web 1.0時代的計算機交流的傳統模式，如電子郵件、BBS、門戶網站、聊天室、博客等，新交流方式的發展疊加了網絡化過程，再借助高速寬帶、無線上網 (Wi-Fi) 和手機3G網絡的普及，促進了網民的高度交互性和觸網的瞬時性，從而催化了新的社會系統分化。

新近基於對Web 2.0工具的研究，如克羅地亞學者沙滕 (Markus Schatten) 等人發現，從BBS論壇、「維基」(Wiki) 開放編輯百科全書、社交網絡、社會書籤到播客等，這些網站公共界面的變化是用戶參與和技術系統相互間結構耦合的結果⑥：輸入機制愈簡單，相應社會系統相對於環境系統而言就愈具有影響力。在各類社交網站中，推特的公共界面極為簡單和友好。自2006年創立以來，推特在2008年經歷了用戶規模的暴增 (1,382%)，位居各類社交網站之首。2009年2月，推特的用戶規模超過700萬，成為有工作的成年人中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站⑦。

網站公共界面的變化是用戶參與和技術系統相互間結構耦合的結果：輸入機制愈簡單，相應社會系統相對於環境系統而言就愈具有影響力。在各類社交網站中，推特的公共界面極為簡單和友好。

就推特的中國用戶而言，他們既具有推特用戶的一般特性，也因為中文輸入和「防火牆」的存在而發展出一些獨特性，兩者結合產生了推特的政治效應。在推特的中國用戶當中共享的反威權認同，以及推特發言操作時採取的相互選擇性轉推 (Re-Tweet, RT) 與回應 (Reply) 等具體的協調行動和機制中蘊含的協調方式，我們稱之為「共時性」。這是中國用戶基於使用這個被屏蔽的境外新社交網站的結果，卻與過去十數年來中國社會運動的自耦合成長呈現驚人的結構一致性。

如同《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在語言學領域原本已經具有的哥白尼革命 (Copernican revolution) 的意義，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認為，語言學必須從傳統語言學中「歷時的」(diachronic) 導向轉變為「共時的」(synchronic) 取向，也就是把語言系統當成一個結構的、功能的系統。結構主義者列維－斯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 也持類似的「共時性激進主義」，在與薩特 (Jean-Paul Sartre) 的對戰中堅持共時性與歷時性的對立。這個概念同樣佔據心理學家榮格 (Carl G. Jung) 畢生的研究。「歷時性」(diachrony)，對他們來說，都等同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榮格的定義對理解推特政治更富啟發性，即「有意義的一致性」、「不尋常的平行主義」或者「一個不同尋常的聯接原理」(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 ⑩。

在推特語言中，共時性體現為推特的技術特性與推特中國用戶的活動所共同構成的、既有象徵性信息又與「不同尋常」的事件關聯，體現為用戶參與交流和推特系統界面的結構耦合，也體現為既有社會自組織與推特界面的結構耦合。具體來說，從推特的中國用戶使用方式——與歐美用戶相比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可以發現三個有趣的技術特性，分別對應前述推特政治的三個特點，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共時性作為推特政治自組織語言的具體含義。

### (一) 競合性

所謂「競合」(contestant grouping)，是社交網站的聚合作用加上言論的結果。簡單的推特界面並無通常意義上的公共界面，只有根據推特用戶定制的個人化界面。而所謂「定制」，係推特用戶根據推特的言論—社交的雙重功能而設置，即在「回應與轉推」、「跟隨／屏蔽」的簡單功能設置間進行選擇，就能在對話與傳播的同時選擇朋友並吸引更多的跟隨者。在每個用戶最初應用的階段，選擇可能是基於初始網絡(線下的網絡或受特定用戶的吸引)，但推特的開放鏈接形式構成了言論交流的重疊網絡，然後用戶可能基於言論的偏好而發現新的朋友，並增加朋友定制。這一過程的另一面就是發言者能吸引到更多的跟隨者，他們構成相互鏈接、重疊的密集化網絡。比如艾未未的每條「推」(tweet) 直接顯示在數萬跟隨者的界面，然後通過這些跟隨者的跟隨者網絡繼續擴散。

這一過程中，相比開放度更大、網絡聚合度卻差很多的聊天室、BBS等Web 1.0時代的網絡交流平台，交流遵循盧曼的「每一個主張都招致相反意見」、或者

在推特語言中，共時性體現為推特的技術特性與推特中國用戶的活動所共同構成的、既有象徵性信息又與「不同尋常」的事件關聯，體現為用戶參與交流和推特系統界面的結構耦合，也體現為既有社會自組織與推特界面的結構耦合。

「每一次交流都能引發抗議」<sup>⑨</sup>的法則，而推動了1990年代末至今中國互聯網空間的政治化，體現了互聯網技術對社會結構的初步影響。更重要的是，推特的「朋友—跟隨」的社交選擇機制改變了互聯網用戶聲譽積累的網絡化基礎，從而導致兩方面的競合效應：一是將「尋找相同者」的交流認同直接體現在基於言論的「跟隨」選擇，結果，中國推特用戶言論的傾向性相當一致，或稱「極化」；二是在大致相同傾向的基礎上，用戶之間的言論競爭不再是相反性差異，而是相同性差異，即深度、視角以及激進程度等的差異。在此競合基礎上，推特言論的政治化不過是一個總體性結果。

## (二) 開放性

相比BBS論壇和博客，簡單的推特界面保證了易接入性 (easy accessibility)，只要用戶接入就能直接到達網絡用戶界面，而且推特界面完全定制化、私人化，並向API開放。Twitter.com作為一個免費社交網站，開放部分源代碼，允許用戶搭建API共享推特用戶的基本數據，作為第三方的用戶終端。迄今為止，推特已有一百多個常用的API，其中不少API (如Dabr) 還允許用戶再次開發，次級聯接到其他網頁上。同時，各種基於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序 (Applications, Apps) 也得到迅速開發。因此，作為開發源代碼運動結果之一的推特從一開始就繼續了開放源代碼運動，使得推特在2009年「7·5事件」後被中國政府屏蔽只受到短暫影響，大量的API，連同各種利用代理服務器的專用「翻牆」軟件 (如「自由門」、商業虛擬私人網絡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等，保證了推特中國用戶的連接，包括手機連接的方式。

在2009年谷歌 (Google) 收購推特公司的傳聞發酵中，谷歌在自身網頁上開放了推特API開發引擎 (Google App Engine)，並在2010年初新推出的社交產品 Buzz上整合了推特，使得Buzz變成了在中國有更大用戶群的谷歌帳戶所有者的推特API。微軟Spaces社交網站對推特的整合更早，只是礙於界面繁複，影響力較有限。所有這一切開放性的努力，都保證了推特的易接入性，而易接入性正是用戶群落發生結構耦合的關鍵，通過最大限度的自身開放 (源代碼) 來增強網站公共界面的開放度，使得所有用戶隨時隨地處於在線狀態，看到他人的「推」，並且發出自己的聲音。

推特網站的此種開放性，與「7·5事件」——作為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的插曲性事件——之後的被屏蔽和中國互聯網整體控制的加強，形成一個可跨越的「數字鴻溝」，或曰「矽幕」 (Silicon Veil) 之外與全球開放互聯網環境相耦合的系統。如馬圖拉納強調的，當「中介與系統間的操作性的動態一致性存續，崩解 (disintegration) 就不會發生」<sup>⑩</sup>。也就是說，只要互聯網還是互聯網，那麼即使互聯網的一部分被物理隔絕為局域網，這種隔絕也不會徹底奏效，否則，局域網將遲早面臨系統崩潰。

推特網站的開放性，與「7·5事件」——作為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的插曲性事件——之後的被屏蔽和中國互聯網整體控制的加強，形成一個可跨越的「數字鴻溝」，或曰「矽幕」之外與全球開放互聯網環境相耦合的系統。

### (三) 微博客

多個試驗已經證明，推特的140個字(母)限制，對英文來說也許只夠表達簡單的信息，但中文的140個漢字，卻可傳遞足夠豐富的信息，信息量大致相當於英文的四倍<sup>②</sup>。結果，與幾乎所有其他社交網站以及推特自身的主流設計初衷不同，儘管推特並未推出專門的中文界面，但是對中文140個字的限定將推特變成了一個微型博客(Microblog，又稱「微博」)，而使得每一「推」具有更豐富的意義，超出了通常社交網站的社會功能。

這一點對於增加「推」的內容的實質性是至關重要的。每位參與討論的人，能將自己的觀點、立場和問題清楚地「推」中展示，這不僅能吸引社會運動知識份子以及所有願意利用推特發表意見的普通人和意見領袖參與推特討論，並且給予所有討論者公平的機會，使他們通過參與討論成為新的意見領袖。他們能夠通過一次或幾次發推及時上傳充分的信息，製造話題，進而傳播，最終擴散到其他論壇與傳統媒體。換言之，推特的微博形式已經將推特塑造為中國最大的政治博客社區。與之相比，另一個政治博客社區(「牛博網」)因遭受互聯網審查而被迫隔絕，其上類似的聚集效應和政治極化效應同樣可以佐證中國政治博客的政治傾向。

比如著名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艾未未，每天運用推特發送汶川地震受害學生的信息。更著名的例子是廈門的一位普通的抗爭運動份子郭寶峰，在2009年7月14日被拘留訊問時，尋機利用手機發出了一條「求救推」，引發一場全國性拯救行動，得以在關押十五天後無罪釋放<sup>②</sup>。此間的行動效應，來自推特言論界面的「跟隨—轉推」機制。

一方面，這來自推特用戶發言的跟隨效應。通常，一位用戶跟隨者愈多，他的發推量也愈大；同時，朋友數量有限但愈多，發推量呈更高倍率的遞增，顯示推特用戶的網絡效應對言論有顯著正激勵<sup>③</sup>。另一方面，這又源自推特的轉推功能，用戶只要非常簡單地點擊轉推符就能即時轉發任何一條「推」，比普通論壇上刷新一條帖子遠為簡單，而且能長期維持對一個特定「推」的關注。重要的是，這一不斷轉推、傳播的過程就是語言形成共識性協調的功能，「不斷地將不尋常變為尋常，將原創變成共意，反覆地獲取與排除，以及以此將這種能力永存自身的同時，它也能夠改變自身」<sup>④</sup>。其中，當下社會運動的抗爭意識在推特的參與討論中體現得極其充分，並因推特「跟隨—轉推」機制對同性差異的激勵而更趨激進。

因此，從推特的社交功能設計、易接入性及其「中文化」結構產生的推特用戶言論政治化與網絡聚集中，「在場」，作為推特政治的語言，可以被用來描繪推特用戶的可操作或可觀察的行為的共識協調；不僅表現在日常交流中的意見同質性，也突出呈現於推特用戶所關注的行動中。在行動中，「在場性」以兩個維度的共識聯接為中介：

儘管推特並未推出專門的中文界面，但是對中文140個字的限定將推特變成了一個微型博客，而使得每一「推」具有更豐富的意義，超出了通常社交網站的社會功能。這一點對於增加「推」的內容的實質性是至關重要的。

(1) 抗爭行動參與者或現場觀察者在行動現場的即時發推、隨行動或事件進展過程的連續發推、以及從回應中得到反饋的行動調整；

(2) 更多非現場推特用戶通過推特網站即時獲取現場行動或事件進展的信息，並參與討論、轉推消息，以及提出意見，現場行動則共時化為推特用戶同步見證、參與、影響行動進程的更大範圍的集體行動。

例如，2009年11月23日廣州市政府前發生的番禺市民反對垃圾焚燒廠建設抗爭事件中，當地著名社運活動家北風(溫雲超)和長平在現場發推，傳遞事件進展情況，受到推特網站上熱烈關注和討論。他們雖非行動的組織者，但傳遞了推特網站其他社運支持者與活動家經由實時討論而趨向的共識性意見，並傳達給現場抗爭活動參與者，力勸參與者在充分表達抗爭訴求後於午後解散。雖然他們最終未能說服大多數未經充分組織的參與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次抗爭的烈度，並將現場的和平抗議轉為一次推特行動。



廣州著名社運活動家北風(溫雲超，左)與長平在現場使用手機發推，傳遞現場信息。

從推特的社交功能設計、易接入性及其「中文化」結構產生的推特用戶言論政治化與網絡聚集中，「在場」，作為推特政治的語言，不僅表現在日常交流中的意見同質性，也突出呈現於推特用戶所關注的行動中。

類似的，只要不特定的推特用戶參與某次抗爭行動甚至偶發事件，只要手機或其他上網信號不被屏蔽，都可能將推特網站變為一個實時轉播(包括文字、照片和視頻鏈接)和實時討論的平行空間，將分散、偶發的事件變為以推特為平台的抗爭運動的一部分，即「意義的一致性」。而從中體現的，是抗爭運動訴求的共時性，即權利的在場：權利的現場抗爭和推特用戶的言論自由，分別穿透了威權對抗爭行動的分散化控制和對互聯網的管制，實現了遠程行動者的聚集和權利的在場。

### 三 討論：權利的在場

通常，結構耦合的量度需要對結構一致性做定量分析，但是，對觀察者來說，描述和解釋同樣是科學的。因為無論生物系統還是社會系統的現象都是即時性的，需要觀察者將其過去和未來予以聯接，並進行形而上的抽象，才能理解其連續變化。在控制論中，結構耦合作為一個「行為協調的協調」的結果，本身就要求觀察者對觀察的反思。因此，本文對推特政治背後的結構耦合現象重在描述和解釋，更精細的對結構一致性的定量分析留待將來深入研究。

簡言之，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共時性」概念，可以概括上述推特中國用戶作為共識協調的方式，也就是推特政治的「語言」，代表中國推特政治的特色。相對應的，從推特社交網站的聚合性到其政治化，從言論到行動，其中的「跟隨—轉推」機制所反映的推特參與結構與中國社運（維權運動）之間出現有趣的「技術—政治」的結構耦合。

結構耦合不限於單一維度，常常是多維度的，也不限於兩個系統，可能是多系統的；並且隨時以結構變化的崩解為條件中止耦合，使耦合停留在一個較低的狀態。在推特出現之前，關於中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公民社會這一假說，就因為威權審查制度的干預和加強，隨時面臨崩解而極不確定。但是，推特政治的形成，特別是推特網站本身的開放源模式以及它所鼓勵的API開發，有力促進了互聯網與公民社會或抗爭運動的結構耦合。

推特技術上的極大開放性或易接入性產生的共時性政治，創造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意義的「高度的在場可得性」(high presence-availability)，進行着「時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社會組織化：當推特空間交聯抗爭現場的同時，這一Web 2.0的分布式交互網絡猶如吉登斯所說的時空組合的社會「儲存器」<sup>26</sup>，平行於國家機器的以社會監視系統和經濟社會信息系統為代表的強大「儲存能力」，最大限度地彌補了現代監控社會對面對面交往（結社與集會）的干預而造成的缺失，從而強化了Web 1.0時代的互聯網作為公共性的棲身之所，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場」姿態將推特轉化為對政治事件的直接審議和抗爭行動。

因此，這樣一種交流共時性，乃基於中國互聯網審查制度或「防火牆」系統，然後賴於為「翻牆」而開發的形形色色的「翻牆」軟件和高度分布的存儲器（或稱「雲計算」[cloud computing]）。這是中國的推特政治與民主選舉體制下比如美國推特政治的本質區別，而突顯共時性的現實政治意義，即權利的在場。理論地說，權利的隨時在場，及時、連續地出現、表達公民的聲音和行動代表着積極的權利行使，而得為權利；反之，權利的不在場，被威權壓制或驅逐，則意味着權利的懸置或剝奪。在場，因此意味着直接民主的體現和以直接民主為意義的民主參與。進而，當權利在場的聚集與直接民主結合，實現某種程度的社會團結，就不僅意味着個人權利，更意味着一個公共政治空間從虛擬社區向現實政治的擴展。

在推特出現之前，關於中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公民社會這一假說，就因為威權審查制度的干預和加強，隨時面臨崩解而極不確定。但是，推特政治的形成，有力促進了互聯網與公民社會或抗爭運動的結構耦合。

更重要的是，「啟幕」審查體制即互聯網「防火牆」代表了現代警察國家的警察秩序——感知的區隔 (partition of the sensible)，也是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維權運動發展所針對的威權體制在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按照法國理論社會學家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 的解釋，警察秩序意味着控制每個人、每件事物，將他們經由分配和辨罪來確定各自的位置，譬如身份證制度、人頭稅制度、戶口制度、懲戒矯正制度等等；而所謂「政治」便是針對警察的特定反對者，因為政治的本質在於異見 (dissensus)，而異見並非利益或觀點之間的對峙，「異見是感知與其自身的距離的表達」<sup>26</sup>。換言之，政治特別是抗爭政治與社會運動就是針對威權社會的區隔化並且固定化的警察秩序而進行感知的重新分區的企圖，其中包含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民主思考和現代性所固有的任務——如社會學家伯格 (Peter L. Berger) 對現代性特徵的概括：「異見的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 of heresy) <sup>27</sup>。

事實上，這一發生在警察／監控與異見／自由選擇之間的對抗，幾乎從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開始就貫穿始終、直到現在，構成現代性的鐵籠與抗爭運動之間的張力，推動着民主的進步。只是，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民主社會的共識都以社會控制為中心，也就是對異端或者越軌 (deviance) 的控制，以為這才意味着社會的組織或者秩序，如此認識貫穿了庫利 (Charles H. Cooley) 以來社會學的主流，也反映了「鐵籠」在現代社會的印象<sup>28</sup>。

只有在1968年之後歐洲興起的新社會運動逐漸改變了歐洲政治生態、直到1990年代初逐漸形成了新的共識政治之後，這一情形才得以改變，並且推動着全球社會運動的形成。中國社會運動的成長，同樣是針對威權體制下國家強制／警察制度對公民權利的種種制度性與非制度性限制，而產生反威權的「維權」訴求，並逐漸形成一個生成中的自耦合系統，開始改變威權的性質，趨向晚期威權主義。

所謂「晚期威權主義」，是借用曼德爾 (Ernest Mandel) 的「晚期資本主義」概念改造而來。現代著名托洛茨基主義理論家曼德爾在其名著《晚期資本主義》(Der Spätkapitalismus) 一書中，稱戰後福利國家的發展已經將生產關係不平等再生產為基本矛盾的資本主義改變為以社會關係不平等的再生產作為新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也因此告別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預言的隨時可能滅亡的總危機，而可能長期存續<sup>29</sup>。而晚期威權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性新威權主義上升運動中的東亞特例，指其內部抗爭運動的崛起作為全球性抗爭運動的一部分，從社會的黨國主導型 (state-led society) 開始轉變為形成中的公民社會，而且這樣一個過程是自創生的 (autopoiesis，相對於威權環境而言)，從而改變了威權的性質。但是中國的威權政治體制仍然存在無比韌性<sup>30</sup>，受益於全球資本主義而保有自身組織的再生產能力和威權的強化能力，強化的威權將長期存續。在可預期的未來，推特政治以及抗爭運動整體並無與之全面對抗的空間，也無摩爾多瓦和伊朗的選舉機會可資利用。

在場，意味着直接民主的體現和以直接民主為意義的民主參與。進而，當權利在場的聚集與直接民主結合，實現某種程度的社會團結，就不僅意味着個人權利，更意味着一個公共政治空間從虛擬社區向現實政治的擴展。

所以，當推特的中國用戶基於「防火牆」外微博客的社交網站而發展出共時性政治之後，一個對威權體制下「異見／選擇」的重新分區已經展現，而且這一趨勢不僅關乎虛擬政治與現實政治區隔的調整，更前所未有地將過去在維權運動中不斷主張的權利共時化、現場化，在偶發性抗議活動中通過推特實現了共時性的權利在場。相對於在抗爭行動中採取緊密控制以及更廣泛意義上對社會不滿採取控制的警察秩序而言，中國推特政治的興起，包括反威權主義者的聚集、異見性的話語表達，以及對分散抗爭行動的介入，不啻為一個重新區隔化並且在愈益增加的範圍內將異見普遍化的過程（包括自組織系統內以及向系統外的擴散）。重新分區也意味着通過推特的實時互動網絡的「高度的在場可得性」，獲得新的分布式社會存儲能力，實現在既有警察秩序／社會監控體制擁有的高信息存儲能力對行動者直接監督下所難以遂行的「非分之言」的言說。參與高度政治性和即時性話語討論的推特中文活躍用戶，整體上也可因此被類別化為新的系統分化——「推特異見者」(Twittering Dissidents) 的出現，並被看作是「聰明暴民」(Smart Mobs) 的Web2.0的中國版。

中國推特政治是否將重演摩爾多瓦或者伊朗的情形，端乎摩爾多瓦或伊朗的「推特革命」所依賴的半開放選舉以及一定程度的反對派政治，但這些基本的革命啟動條件在中國可預期的未來均難以看到。

當然，目前的推特政治到底能走多遠，是否能夠探及摩爾多瓦或者伊朗的「推特革命」，只有在更大的系統背景下，或者考慮更多的系統及其結構耦合問題，才可能對中國的推特政治前景做出判斷。無論如何，當谷歌撤出中國風波爆發之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Hilary Clinton) 2009年12月14日發表演說，要求保障互聯網自由，並幫助商業公司開發互聯網通訊軟件，就可以視之為一個更大範圍的結構耦合背景<sup>⑩</sup>。但是，中國推特政治是否將重演摩爾多瓦或者伊朗的情形，端乎摩爾多瓦或伊朗的「推特革命」所依賴的半開放選舉以及一定程度的反對派政治，但這些基本的革命啟動條件在中國可預期的未來均難以看到。

## 四 結論

綜上所述，從2008年起，推特在中國的普及僅僅兩年有餘，而用戶群的增加更受到2009年7月以來網絡屏蔽政策的影響，但卻在過去一年多的短暫時間裏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活躍和抗爭行動能力。更為重要的是，推特中國用戶群的「共時性技術」與「權利在場政治」的結構耦合，使得推特政治成為形成中新興公民社會的最新形式，是對過去十幾年中國互聯網的自由主義交流和同樣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社會抗爭運動的繼承，是一個晚期威權主義的鞏固進程中交互穿透從而產生新的系統分化的結果。

因此，儘管中國的推特政治前景是否如摩爾多瓦或者伊朗般可能在半開放選舉下展現爆發力還不得而知，但是，就其高度政治化、網絡深化和參與抗爭行動的共時性政治所表現的「推特異見者」群體結構的出現和增長，已經暗示着一個瑞恩構爾德所說的新社會革命的可能性<sup>⑪</sup>。如果僅僅在這個社會革命意義上，將中國新興的推特政治稱為「推特革命」，也許並不為過。

## 註釋

①⑦ 參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1年1月19日)，[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101/t20110118\\_20250.html](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101/t20110118_20250.html)。

② Stefan Schmidt, "Die Bedeutung des Internets im US-Präsidentenwahlkampf 2008", *Deutscher Bundestag*, WD1-3000-264/08, 18 January 2009, [http://webarchiv.bundestag.de/archive/2009/0626/wissen/analysen/2009/Internet\\_im\\_uswahlkampf.pdf](http://webarchiv.bundestag.de/archive/2009/0626/wissen/analysen/2009/Internet_im_uswahlkampf.pdf); Aaron Smith, "The Internet's Role in Campaign 2008", 15 April 2009, [www.pewinternet.org/Reports/2009/6--The-Internets-Role-in-Campaign-2008.aspx](http://www.pewinternet.org/Reports/2009/6--The-Internets-Role-in-Campaign-2008.aspx).

③ Laura Gordon-Murnane, "The 51st State: The State of Online", *Searcher: The Magazine for Database Professionals*, November/December 2007, [www.infotoday.com/searcher/nov07/Gordon-Murnane\\_51stState.pdf](http://www.infotoday.com/searcher/nov07/Gordon-Murnane_51stState.pdf).

④ Alina Mungiu-Pippidi and Igor Munteanu, "Moldova's 'Twitter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 no. 3 (2009): 136-42. 當然，無論在伊朗還是摩爾多瓦，這兩個被公共媒體關注的「推特革命」範例，都不成其為真正的革命，只是抗爭 (contention) 或者造反 (rebellion)，推特在其中的作用也被誇大了。如20:20 Web Tech社會網絡媒體研究公司的創建人之一，並曾於2009年在美國喬治城大學任教的米什拉 (Gaurav Mishra) 在接受採訪時指出，用「推特革命」一詞來指稱伊朗發生的抗爭並不合適，因為推特在抗爭反對派活動組織工具中的地位僅僅居第五或第六位。參見Katie Combs, "Iran's 'Twitter Revolution'—Myth or Reality?", 18 June 2009, <http://worldfocus.org/blog/2009/06/18/irans-twitter-revolution-myth-or-reality/5869/>。

⑤ 參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09年中國網民社交網絡應用研究報告〉(2009年10月)，[www.cnnic.cn/uploadfiles/doc/2009/11/11/142713.doc](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doc/2009/11/11/142713.doc)。

⑥ 中國工信部2009年9月3日發布消息，稱截至當年7月中國移動電話用戶達到7.03億，固定電話用戶為3.28億。參見銀刀：〈我國移動電話用戶突破7億 前7個月增6,140萬戶〉，科技資訊網，[www.cnetnews.com.cn/2009/0903/1453279.shtml](http://www.cnetnews.com.cn/2009/0903/1453279.shtml)。

⑧ 中國著名現代藝術家、社會活動家、意見領袖艾未未的推特個人檔案 (<http://twitter.com/#!/aiww>) 顯示，他2009年5月31日加入推特，2010年3月2日跟隨者數目為24,904，到5月17日增為40,275。可作參考，同日著名互聯網意見領袖連岳的檔案 (<http://twitter.com/#!/lianyue>) 顯示其跟隨者有47,049人，另外一位著名互聯網活動家安替的檔案 (<http://twitter.com/#!/mranti>) 顯示其跟隨者為22,353人。這一跟隨者人數可以被假定為推特的活躍用戶，這是在尚無確切技術統計情況下的推斷。中國推特用戶的總體規模，據中國著名互聯網活動家毛向輝的估計約為10萬。據筆者與毛向輝的個人談話，2010年6月29日，北京。

⑨ Joel Schectman, "Iran's Twitter Revolution? Maybe Not Yet", *Business Week*, 17 June 2009.

⑩ 參見推特中文圈中文推客排行榜(2010年3月29日截屏)，如有需要可向筆者索取。

⑪ Wu Qiang, "Whither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Urban China: The Structural Politic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Urban China, post 1989",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2008.

⑫ Humberto R. Maturana,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iving: A Theory of the Living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 7, issue 3 (1975): 313-32; Humberto R. Maturana and Francisco J. Varela, *Autopoietic Systems: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Living Organization*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75.

- ⑬⑭ Humberto R. Maturana, "Autopoiesis, Structural Coupling and Cognition" (draft manuscript), [www.isss.org/maturana.htm](http://www.isss.org/maturana.htm).
- ⑮⑯ 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 John Bednarz, Jr. and Dirk Baec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2; 148, 173.
- ⑰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4).
- ⑱ Markus Schatten, Miroslav Bača, and Marinela Ivanković, "Public Interfaces as the Result of Social Systems Structural Coupl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SIT) 2009".
- ⑲ 參見尼爾森調查公司的調查，Michelle McGiboney, "Twitter's Tweet Smell of Success", 18 March 2009, [http://blog.nielsen.com/nielsenwire/online\\_mobile/twitters-tweet-smell-of-success/](http://blog.nielsen.com/nielsenwire/online_mobile/twitters-tweet-smell-of-success/)。
- ⑳ 參見Roderick Main, *The Rupture of Time: Synchronicity and Jung's Critique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Hove;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2004), 12。
- ㉑ 參見著名社會媒體技術網站Thomas Crampton的分析，"In Chinese, Twitter Actually Means 'Blog'", 12 January 2010, [www.thomascrampton.com/china/twitter-in-china](http://www.thomascrampton.com/china/twitter-in-china)。
- ㉒ 筆者與郭寶峰的訪談，2009年11月18日，北京。
- ㉓ Bernardo A. Huberman, Daniel M. Romero, and Fang Wu, "Social Networks That Matter: Twitter under the Microscope", *First Monday* 14, no. 1 (2009),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2317/2063>.
- ㉔ Cornelius Castoriadis, *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 1975). 轉引自鮑曼 (Zygmunt Bauman) 著，鄭莉譯：《作為實踐的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35。
- ㉕ 參見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著，郭忠華譯：《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權力、財產與國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頁4-5。
- ㉖ Jacques Rancière, "Ten Theses on Politics", *Theory and Event* 5, issue 3 (2001): 10.
- ㉗ 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 著，姜宇輝譯：《政治的邊緣》(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頁15-17；Peter L. Berger, *The Heretical Imperative: Contemporary Possibilities of Religious Affirmation*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1979), 28。其中，伯格指出，「前現代世界宗教確定性下人們的異見只是偶然的……現代性創造了全新的情形，使得人們的自由選擇日益迫切」。「Heresy」一詞的古希臘原意是「能夠選擇」(able to choose)，後來形容宗教信仰的改宗。
- ㉘ Andrew T. Scull,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Handbook of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8), 669.
- ㉙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trans. Joris De Bres (London: Verso, 1978).
- ㉚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no. 1 (2003): 6-17.
- ㉛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於2009年12月14日在喬治城大學的演講，參見[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12/133544.ht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12/133544.htm)。
- ㉜ Howard Rheingold,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asic Books, 2002).

吳 強 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講師。